

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

王丽萍

(湖南工业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鲁迅家庭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进化论思想来说,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严复的影响,但是通过在日留学期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文献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进化”思想对其的影响,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使得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关键词] 鲁迅;进化论;家庭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2-0098-08

Research of LuXun's Evolutionist Thoughts from the Family Ethics Perspective

WANG Li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Lu Xun's family ethical thoughts owe much to such ideas as Evolution theory,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sm. His evolutionist thoughts originate directly from Yan Fu's influence. The direct study of Evolution theory materials during his studying in Japan and the influence of Zhang Taiyan's "The two-way Evolution" theory show that Lu Xun's evolutionist thought of family ethics is featured with a focus on youth development, spiritual enhancement and present involvement. Therefore, Lu Xun holds that par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give freedom to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Lu Xun; Evolution theory; family ethics

鲁迅是时代造就的伟大思想家。他的伦理思想深刻地根植于现代中国的土壤中,并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通过对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进化论思想对其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促使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孩子,要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19世纪中后期生物学领域提出的进化论理论认为生物都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成为其思想的

核心表达。出于富国强民的时代需要,近代文人学者普遍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影响着近代中国人思想的变革,其中康有为、孙中山、严复、章太炎等都是进化论思想的拥护者,严复更是结合当时社会的普遍需要,在系统介绍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扩大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教育了一批仁人志士。

一 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根据对生物界的深入观察而得出的理论,在当时打破了神造论以及物种

收稿日期: 2012-01-06

收稿日期: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沙市社科规划办 2008 年重点课题“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研究”(2008030)

作者简介: 王丽萍(1975-),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学。

不变论的唯心主张。恩格斯将其看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斯宾塞在其《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将生物进化理论运用到了社会领域,认为社会也是不断进化的,遵循着“适者生存”规律。这种将生物进化规律通约为社会规律的做法,遭到了赫胥黎的质疑。在其《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人类社会虽然也是不断进化的,但是与生物进化所遵循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同,伦理规律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 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化论源自达尔文对于生物进化的研究和发现。达尔文通过研究认为地球的生物都处在一种线性的进化过程之中。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有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在于指出了物种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机制,就是自然选择。达尔文观察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着繁殖过剩的现象,繁殖过剩必然导致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所以不断地有生物死亡,也有生物幸存。在这场生存与死亡的搏斗中,最基本的生存原则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直接产生了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以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看待人类社会。他们认为,首先,人类自身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并且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处于进化的高级阶段,而有的则处于低级阶段。庸俗的达尔文进化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全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的人种理论。这种理论的实践所产生的令人恐惧的后果已经充分展露在二战法西斯的暴行之中。其次,生物进化论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预设了方向。既然生物进化是呈线性发展的,那么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必定有一定的趋势和模式。再次,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选择是合理的方式,因为这种机制促使了生物物种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强大的国家、民族和群体对于相对落后群体的侵略和打压似乎也符合自然选择。人类社会间的相互博弈,以及某些野蛮方式所进行的人类社会选择也是自然原则的结果。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对于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时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达尔文主义对于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激发民族自觉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严复译述《天演论》到马君武翻译出版《物种起源》,其中所介绍的进化学说,是在民族危机激化和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成体系的、有利于推动救亡和变革的理论形态。当时,进化论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首先,进化论使中国开始认识自然科学的力量,并且改变传统守旧的和思维习惯。中国传统的历史宇宙观是以古代为楷模,效祖宗之法,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传统思维,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构架,只能为传统的纲常秩序提供依据,而不可能带来改变现实制度的观念。西方进化论引进后所衍生的历史进步观念,则以不断前进的社会趋势为发展方向,为变法改制,以至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环境的根本变革提供了价值论证,并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其次,进化论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依据。既然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也在进化过程之中,而且按照自然选择法则,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会遭受淘汰,那么就必须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状态,政治的革命成为必然的考量。最后,进化论开启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大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本受到了进化论的思想的教育和影响,鲁迅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二) 《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进化思想

《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达尔文的朋友兼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赫胥黎的著作简要地向人们介绍了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目的在于阐明进化论为其伦理学提供的“科学依据”。他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人性从恶到善的改变,以及社会美德的进展,关键在于消除生存斗争。书中,赫胥黎阐发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肯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历史演变的重要法则。然而赫胥黎写作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单纯表达对达尔文主义的赞美,而是要抨击斯宾塞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泛化。因为在赫胥黎看来,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与自然历史演化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是一个伦理过程而自然历史的演化则是一个生命过程,人类社会的进化所依据的是伦理,“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1]而自然的生命进化过程却不会考虑到伦理要求。虽然在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竞争、适应,但是人类社会的竞争却不是惨烈的你死我活,

适应也并不是纯粹的“最适者”生存,因为在人类社会存在伦理法则,人们因为伦理法则的存在而可以以互助互敬、相亲相爱的善行来抑制残酷竞争的发生,即使是“不适者”在人类社会也会得到救助。

赫胥黎的这种主张具有对进化论自然主义的超越性,肯定了人类社会利他性的存在。而斯宾塞则坚持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与自然领域的普遍适用性,认为竞争不但是自然生命过程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遵循着“最适者”生存的原理,认为行为的善恶与否在于它对外在环境的适应程度和它对个体保存以及种的繁衍与发展的意义。^[2]只要是有利于个体生命保存以及种的繁衍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这种善恶标准将自然界适者生存法则完全泛化到人类社会,因此可以说斯宾塞的主张不但“漠视了人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特质”,^{[3]139}而且对于“利己主义在发生学意义上的优越性和超前性”^{[3]127}的坚持,可以说将人类社会推向了“人对人像狼”的自然状态。针对斯宾塞的自然主义主张,赫胥黎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仅仅是自然历史领域适用的法则,人类社会发所应当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

(三) 严复对进化论的改造

进化论是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严复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传入中国的。严复在其翻译的过程中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作了些修改,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将斯宾塞与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结合,突出了进化论的社会意义。

严复在留英期间,以自然科学的学习为主,同时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对赫胥黎维护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则,反对“任天为治”放任主义的宗旨并不十分赞赏,更反对赫胥黎对斯宾塞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严复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应遵循的法则,所以他在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时,不但取其进化与伦理主题的一半将其译为《天演论》,而且对于其内容也进行了增删,在原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按语,以此来传播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将“物竞天择”的天之道推演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的行为也应当遵循物竞天择的天演公例。认为“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4]1329}强调“变”、“异”、“择和争”对于社会发展的特有价值;二是接

受了社会进化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直线向前,日趋完善的单向发展过程,因此主张一种人类社会永恒进步论。“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那治必有时后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4]1392}如果说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意欲将自然进化法则与人类伦理法则区别开来,那么在《天演论》中严复则是将两者统一起来,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作为人类社会伦理的基础,倡导一种富有竞争性的进化伦理观念,并且指出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天演论》中严复以《周易》《老子》中的思想来比附阐述进化论的思想,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宣传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不断地演进的,按照此理则后一定胜于今。第二,进一步阐述了人类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存斗争、自然选择,而“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自然是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第三,结合民族的危机状况以及救亡图存的理想认为“任天为治”、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而是应该奋发图强,“以人持天”求得个体的生存与民族的生存。

《天演论》对进化论的生物进化、生存竞争的观点的诠释,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觉得,在这个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为原则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民族仍按照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因此提出了“自强保种”,以挽救危难之中国的要求,呼唤人们在“天演合例”的残酷事实面前警觉起来,发愤图强,保种进化。《天演论》中的进化主张也给了处于危难中的国人一种希望:现今的中国虽然孱弱多难,但不能说会一直处于孱弱状态,因为从进化论上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向上的趋势,因此只要国人努力自救以自强就可以挽救自身的危难,变为强者。正是这种乐观的进化史观使《天演论》在1898年正式出版之后,就受到了仁人志士的热烈欢迎。当然,他所宣扬的进化论带有庸俗进化论的痕迹。

胡适以下的这段话最可说明《天演论》在当时的影响,他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

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国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5]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时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者、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者都苦苦地探索救国之路。进化论中之“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心理需求。他们把进化论看作为中国变法自强、保国保种和救亡启蒙的理论武器。对于改造国人的世界观,以“优胜劣汰”促使国人觉醒,激励国人奋发,以图自强、自立,保国保种,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换起到了巨大的思想推动作用。但是,进化论毕竟有其自身的思想局限和消极影响,如果执其一端,那么所引导的只能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且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维新变法、社会改良也只是在保存现有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救亡图存,不能根本改变国家、国民的命运。

因此进化论思想也只不过成为一种盛极一时的政治运动,在《〈进化与退化〉小引》译文中鲁迅回忆指出:“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6]255}

二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在对严复、章太炎以及斯宾塞、赫胥黎进化论思想的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鲁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严复《天演论》中进化论思想,也就是“物竞”、“天择”等主张,以及社会进化、国家富强在于国民的不断努力、自强不息等思想。还在南京路矿学堂时,抱持着对新事物新思想的学习热情,鲁迅就如饥似渴地拜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并能背诵其中的段落,深受其中思想的鼓舞。他曾回忆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

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7]305-306}读《天演论》仿佛已经成为他课余生活的一部分:“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7]306-306}在《鲁迅传》中,林志浩写道“《天演论》的有些章节熟到背诵如流的程度”^[8]。

除了受严复《天演论》的激情鼓舞以外,鲁迅还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俱分进化”思想的影响。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通过读《民报》、听章太炎先生的讲学,较为系统地接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的观点。这在《鲁迅全集六》中《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是有所记载的,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章太炎先生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深深地影响了鲁迅,促进了鲁迅思想的成长。

从总体来看,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有人总结出了“自然进化论”、“革命进化论”、“俱分进化论”等观点,但能够代表章先生思想深刻性的还是“俱分进化”思想。在“俱分进化”的思想中,章先生肯定了自然进化的思想“吾不谓进化之说非也”,但是针对当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人类社会所持的进化发展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仅以进化论为标准来判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否思想的局限性。

1906年他在《民报》第七号发表《俱分进化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进化思想,表示了对进化论的质疑与批判。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态度是有所承认亦有所批判的。章太炎并没有否定进化这一理论,1897、1898年所著的《菌说》《原变》都肯定了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在章太炎看来,虽然人类也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人类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生物进化的规律,但是人又不同于生物,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但包括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智识发展,也包括人类善恶道德发展和人类苦乐感受的心理发展。章太炎分析指出西方进化论学说本质上是来源于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将进化的实质等同于理性的发展,因此以人类智识的进化发展得出了人类社会必然进化发展的结论。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单以人类智识的进化而进化的,从善恶、苦乐这两个层面的并进对人类社会必然进化发展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

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而。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9]386}从善与恶、苦与乐的并进具体阐述了“俱分进化”的思想。

章太炎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指出:人较之于动物,无论是在行善、感受乐方面,还是在行恶、感受苦方面都要强出很多。人虽然可以做出很多善行,但也可以做出更大的恶行;人虽然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却也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人类社会中的善恶苦乐并行兼进,其导致结果也必然是二者的相互抵消,由此得出结论说“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9]387}章太炎认为,进化的事实不可否认,进化的结果却不是人们所一心向往的善乐,而是善恶、苦乐的齐头并进,因此进化对于社会的作用也就不足取了。社会的进化发展观只是适用于智识的进化而在善恶、苦乐方面却未必然,知识的进化也并不一定能够将人类社会整体推向道德的理想王国,也不能必定将人们带入至乐胜境。所以说,进化并不能使世界“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这样也就指出了这种乐观进化论在人类社会问题上的局限性。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理论,对于当时的仁人志士来说,无疑会觉得无所取或者会降低人们的革命热情,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章太炎的批判精神、质疑精神。可以说,“俱分进化”的思想为人们从价值层面辨证地认识进化史观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理论贡献也被后来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对理性、对进化史观的批判所印证。

严复以及章太炎的进化思想、日文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海克尔的人类种系发生学,还有穆勒、斯宾塞和梅契尼珂夫的人类文明进化观,均对鲁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样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也就超越了早期所接受的《天演论》思想层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进化论思想。

三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特点

鲁迅接受了生物进化的主张,他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进化发展的历史观。他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而不是凝固或倒退的。鲁迅所主张的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是同封建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德观点针锋相对的,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莫敢言变”

的僵化观念是截然相反的,它不同于改良派折中调和的庸俗进化论。他把这种发展进化的观点运用到伦理观上,就形成伦理道德进化发展的思想。他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信条,从来不用过时的封建伦理来衡量、限制新事物。恰恰相反,他正是在事物发展的必然历史进程中看到旧道德的荒谬、腐朽、虚伪,坚信道德是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发展的。鲁迅在早期以至中期,就是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封建道德展开批判的。他依据生物进化的思想,指出青年是必胜于老年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6]5}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救救孩子”、“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生物进化主张。与当时的仁人志士大多将所接受的进化思想应用于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考量不同,鲁迅一反当时人们社会进化的整体论,将社会进化的可能指向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在社会进化论上表现出对人之精神的重视。同时在历史进化论方面,也没有因对进化的盲目信念而乐观地寄希望于将来,而是主张倾力于现在,以为唯有对现在对现实的逐步改变,才能实现发展进化的理想。鲁迅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而又非盲目乐观的进化主张,正是因为抱着这种进化观念,他提出了“立国首在立人”的思想,将“立人”作为其一生的追求。

(一)生命进化论——青年必胜于老年

鲁迅在《人之历史》中肯定了人及人类都是处在一个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的生物进化中的观点。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来人类与动物并无甚大区别,个体的进化也就是种族的进化,正是无数个体的进化汇成了种族的进化,因此肯定个体进化对于种族进化的意义,“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10]354}鲁迅看到了在整个的进化过程中,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的生物进化观,指出青年是必胜于老年的。“凡是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10]354}在鲁迅看来,“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10]386}只要是活

着的人就都是有希望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在1932年写在《三闲集》序言中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其生物进化论思想的鲜明写照:“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6]50}人是生物之一种,所以适用于生物发展规律的自然也适用于人,既然生物是不断进化与完善的,那么,人也应当是如此的。从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来说,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青年时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突破一切障碍的勇气与豪气;从代际发展的角度来看,青年永远是代表着将来代表着发展的,老年则代表着过去代表着保守。

鲁迅主张青年就应当欢欢喜喜地向前去,老的亦应该欢欢喜喜的死去,“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11]321}作为向死的老年更应当为前进着的青年做出些奉献与牺牲,“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10]355}鲁迅正是因为将青年看成是社会进化的真正力量所在,从而乐于牺牲自己,将自己奉献于青年。

鲁迅对于帮助青年采取了一种奉献牺牲的态度,青年们提出的要求能帮的就帮,从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时间与精力。正如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我这三四年来,怎样地为学生,为青年拼命,并无一点坏心思,只要可给与的便给与。”^[12]他热心支持学生运动,在北师大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与章士钊、杨荫榆进行斗争;支持青年木刻事业,各处收集、帮忙展出等;支持文学青年,给人看稿子改稿子编书校字等等,甚至为青年的寝食操劳。

鲁迅的进化论,不是把人类历史看作如动物一样是适应环境的过程,其强调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能够真正改变社会的是社会中具有主体进化之精神的个体。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只致力于社会整体的进化而忽视个体精神的进化,这种变革将是不彻底的或将面临失败的。如专注于器物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精神进化的漠视。

(二) 社会进化的“真源”——人之精神进化

受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对严复等人的社会进化发展观的片面性与盲目乐观产生了质疑。鲁迅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放弃了对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探讨而将希望指向了个人,尤其是人之精神进化;在鲁迅看来社会进化只能是个人进

化的结果,但又不是少数个人进化所能代表的,与社会进化的英雄史观不同,鲁迅认为只有社会大众的进化才能代表社会整体的进化,并因此以其犀利的解剖刀似的笔触展开了对个人的剖解,开始了对人性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但包括“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的立新人主张,而且也包括针对中国国民的性格所展开的批判: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正如许寿裳在其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所说,鲁迅一生所奋力去做的都是围绕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13]

鲁迅在早期作品中,认为单单强调科学只能使人生枯寂,倡求人性于全的《科学史教篇》、提出立人观点的《文化偏至论》、重个体精神之进化的《破恶声论》、倡人文精神的《摩罗诗力说》等创作都表现了对个体进化的强调,而且这种强调所重点指出的是人之精神的进化。

《科学史教篇》中基于对西方科学演进过程的整体思考,认为个体进化不但包括智识进化而且也应当包括人文精神的进化,个体进化是个人人性的全面进化过程。鲁迅通过对科学史的分析指出,偏重于科学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从科学史之演进,我们发现,人文科学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人类探索未知的精神促动了科学史的演进,因此鲁迅强调指出“故科学,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10]35}他又提出了以求人性于全促人类文明,也即追求社会变革与进步,应当以促进人性的进化为目的,主张科学与人文不可偏颇,培育具有健全人性的人,以此来促动社会的变革与进化。

《文化偏至论》则明确提出了“立人”的主张:“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

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0]58}以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0]47}的主张。所立之人也就是尼采所主张的具有独立意识、富有抗争精神的“超人”,虽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超人”的出现将遥遥无期,即使出现了也注定要成为孤独者,“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鲁迅没有因此失却希望,而是相信“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10]341}

正是因为看到了社会进化的“真源”所在——人之精神进化,鲁迅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展开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如1921年的《阿Q正传》对国民性进行了整体的症候式分析,“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实在是一副中国人坏的品性的‘混合照相’,……”^[14]此种破旧而后立新的努力,也是出于对新人的切切期望。

(三)历史进化论——倾力于现在

鲁迅批评“心神所注,辽远在唐”的复古主义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的人物“非自杀以从古人”^{[10]69}不可;他明确主张,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有根源有规律的:“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根柢,如流水之必有源泉,并木之茁于根茂……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10]48}在他看来,进化的过程不是和平地进行,而是通过不断的矛盾斗争来实现的,“和平为物,不见人间。”“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10]69}他还认为,进化论的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新陈代谢的,即“自卑而高,日进无既。”^{[10]38}“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11]27}。他强调事物的进化不可抗拒:“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10]70}鲁迅认为,既然事物矛盾着的双方始终斗争着,那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不可能的,矫往过正才是事物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他指出:“文明无不尽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所当然。”^{[10]35}

鲁迅认为进化不但是一个生物过程也是一个时间过程,即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过程。因此进化论也就不但涉及到生物的进化也将涉及到时间的延续。关于时间也就是人们一般认识中的三维形式:过去、现在、将来。如果要在三者中进行选择的话,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将来,因为将来是未知的,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好奇与希望。鲁迅也

是对将来充满希望的,“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6]56}但是鲁迅并没有沉湎于对将来的美好希望中,为人们勾画什么美好蓝图。鲁迅所注重的不是 TO DO 而是 DOING。

在鲁迅看来,为人们勾画美好蓝图确能得到人们的赞誉,但是如果只是单单地给出蓝图而没有为着这蓝图去切实地做,这个蓝图也就如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鲁迅力主人们要正视现在,以现在的努力抗争来追求将来。1918年所发表的《人与时》中,鲁迅就分析了人们对待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同的态度,“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而“时”却说“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11]35}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因憧憬而对将来持一种向往,因回忆而对过去持一种顾念,无论是向往将来还是顾念过去,人们都没有赋予现在以价值,现在没有将来好,现在不如从前。正如“时”所说,你们这样是侮辱了我的现在,从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相继的,过去会延续到现在直至渗入到将来;现在是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将来的,然而现在却接续着过去与将来;将来既有对过去、现在的否定也有对过去、现在的延续。在这之中,我们否弃了现在也就阻断了由过去到将来的路,也就否弃了将来。

鲁迅更执着于现在,而不是空寄希望于将来。在鲁迅看来,现在的抗争即是为了将来,只有现在的抗争才会有不一样的将来,否则将来亦只是过去的翻版,如封建家庭中的孩子,小的时候受家长的欺压,到自己做爸爸时亦是去欺压自己的孩子。有的明白希望在前,对待现在的态度却不积极,总是一味地等待希望的到来,因此“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15]3}鲁迅发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的生存而奋斗……”^{[15]610}的呐喊。鲁迅的学医、从文、支持青年、与论敌斗不都是积极要求改变现状的举动么,也就是足踏在地上为中国之将来而做的踏实努力。

在鲁迅不懈努力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现实所给予的无情打击,也有过后退颓唐的时候,在《自嘲》诗中对于自己的碰壁进行了自我解嘲,末句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可以说是鲁迅当时的一种心境。自1909年鲁迅留学归来之后,与留日期间的大量创作问世相反,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辑录校订古籍,抄古碑,收拓片,钻研佛经,搜

集汉画像,对古代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材料的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其中的原因,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说的很清楚:“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468}可见,在过去、现在、将来永续的历史过程中,鲁迅体会到了个体的无助,但是他并没有一直沉寂下去,“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6]468}因而有了1918年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不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第一声怒吼,而且也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血淋淋的吃人史。自此,鲁迅对封建传统封建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为民族的存亡复兴而执笔,走到了启蒙与救国的前沿。鲁迅看到了将来决不是一两个个体的将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将来。只要有将来在,就有希望在。鲁迅抱着对将来的希望,竭力去支持青年,展开对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批判,以期给将来的子孙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再是“黑屋子”、“人肉的筵席”。

倾力于现在的进化思想也就从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进化的途径只能是以现在的努力去争取,而不应该以过去扼杀现在,也不应以将来抹杀现在,进化并不是可以等来也不是可以盼来的。这一点对当时进化论思想不但受到所谓“国粹派”的阻遏而且也受到反动势力扼杀的情势所提供的启示尤其重要。中国的进化并不是可以自己完成了的,进化不但需要进化力量的切实努力,而且也更是惟有现在的切实努力与奋斗才是真实的,也才是获取进化的主要途径。鲁迅的这种倾力于现在的进化论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寄希望于“大同”世界的梦想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在现实中鲁迅展开了对过去的批判,以及在现实中的各种论争,这都是为了将来而做出的努力,鲁迅立足于现实而寄希望于将来,始终相信“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16]

鲁迅对进化论的吸取根据自己的智识进行了取舍,他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满怀义愤抨击“兽性爱国者”“执进化留良之言,攻

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如臣仆不嫌也。”^[17]在《摩罗诗力说》中,他高度赞扬拜伦等援助弱小民族的行为,表达了他同情被压迫者、弱小者的道德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 [1] 赫胥黎. 进化论与伦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3:57.
- [2] 赫伯特·斯宾塞著. 张雄武译. 社会静力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11-42.
- [3] 万俊人.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4] 严复. 严复集第五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胡适. 胡适作品集一[C].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86:54.
- [6] 鲁迅. 鲁迅全集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7] 鲁迅. 鲁迅全集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8] 林志浩. 鲁迅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29.
- [9]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四[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386,387.
- [10] 鲁迅. 鲁迅全集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1] 鲁迅. 鲁迅全集七[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2] 鲁迅. 鲁迅全集十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 [13] 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24.
- [14] 周作人, 周建人. 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233.
- [15] 鲁迅. 鲁迅全集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610.
- [16] 鲁迅. 鲁迅全集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63.
- [17] 鲁迅. 鲁迅全集八[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5.

责任编辑:卫 华